

青少年特质感恩与主观幸福感:生命意义的纵向解释作用*

李丹^{1,3} 陈佳宇^{1,3} 刘思格² 吴德华^{1,3} 尹华站^{1,3}

(1. 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长沙 410081; 2. 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科技城外国语集团立雪小学,深圳 518100; 3. 认知与人类行为湖南省重点实验室,长沙 410081)

摘要:本研究旨在考察青少年特质感恩、生命意义与主观幸福感的发展轨迹,并进一步探讨三者之间的动态关系以及生命意义的纵向解释作用。采用自陈报告式调查问卷对湖南省764名中学生进行为期一年共三次的追踪调查,建立多元潜变量增长模型进行分析。结果发现:(1)青少年特质感恩、存在意义及主观幸福感均呈线性显著性递增,追寻意义呈线性显著性递减;(2)特质感恩的初始水平显著正向预测主观幸福感的初始水平,特质感恩的发展速度正向预测主观幸福感的发展速度;(3)在初始水平上,青少年存在意义与追寻意义均在特质感恩与主观幸福感之间起完全中介作用;而在发展速度上,仅存在意义在特质感恩与主观幸福感之间起完全中介作用。这意味着特质感恩初始水平通过存在意义和追寻意义进一步影响主观幸福感的初始水平;特质感恩的发展速度通过存在意义进一步影响主观幸福感的发展速度。这对把握青少年心理发展的关键期,保障心理健康发展具有一定的现实指导意义。

关键词:青少年;特质感恩;存在意义;追寻意义;主观幸福感;多元潜变量增长模型

分类号:B844

1 引言

2023年4月,教育部、国家卫生健康委等17个部门联合印发了《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生心理健康工作专项行动计划(2023—2025年)》,把学生心理健康工作纳入省级人民政府履行教育职责的评价,作为学校办学水平评估和领导班子年度考核的一项重要指标。这标志着加强学生心理健康工作上升为国家战略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2023)。主观幸福感(subjective well-being, SWB)作为一项衡量学生心理健康的重要指标,是指个体根据自身确立的标准对生活质量进行的综合评估(Diener, 1984)。研究表明,主观幸福感与良好的身体健康、融洽的社会关系、优异的学业或工作表现、低问题行为发生率具有紧密联系(Bücker et al., 2018; Diener et al., 2018; Vujcic et al., 2019)。因此,对于主观幸福感问题的探讨仍是当今心理学的研究重点之一。

1.1 特质感恩与主观幸福感

特质感恩(trait gratitude)是一种稳定、内隐的主观体验,是特定个体体验到感恩情绪的可能,是一种

预定的心理倾向,在频度、强度和时间跨度上会不断改变(王振宇,1992)。纵向研究发现特质感恩均值存在波动。譬如Yang等人(2020)对初一和初二年级的学生进行间隔两个月的测试,发现在两次测试中特质感恩的均值存在波动。任海霞等人(2021)对初中生进行为期15个月的三次追踪研究,发现其特质感恩存在变化。叶颖等人(2023)对大学生的特质感恩进行为期7个月的两次追踪,发现其均值也存在波动。这说明从初中生到大学生特质感恩会发生波动已得到证据的支持。

主观幸福感是衡量个体生活质量的综合性心理指标,反映个体的社会功能和适应状态(郭春涵,2019)。青少年正处于主观幸福感的重要发展阶段。生活满意度作为主观幸福感的关键指标,具有随着青少年发展阶段的推移而变化的流动特性(Mihoko & Kao, 2007)。譬如两项对中国香港青少年纵向研究结果表明,生活满意度在调查期间呈下降趋势(Shek & Liu, 2014; Zhu & Shek, 2021)。Jeong等人(2018)发现韩国青少年生活满意度呈现下降后上升的二次函数形式发展。向燕辉和马丽平(2023)针对中国初中生群体进行纵向调查发现生活满意度在三

* 基金项目:湖南省教育厅项目重点项目(23A0098)。

通讯作者:尹华站, E-mail: yhz1979@sina.com

次施测期间均呈线性增长趋势。这说明青少年的主观幸福感呈现出变化趋势也得到证据支持。

人格特质理论(Theory of Personality Trait)强调人格是主观幸福感的重要预测因素之一(Diener, 1984)。特质感恩是一种重要的人格特质(Kong et al., 2021; Wang, 2020; Yang et al., 2020)。研究发现,高特质感恩个体更倾向于用感激情绪理解他人的恩惠并产生感激之情(McCullough et al., 2002),即更关注和感激积极事物(Wood et al., 2008)。根据扩展建构理论(Broaden - and - Build Theory),感恩具有扩展和建构个体的认知、积累资源的作用,有助于提升个体主观幸福感(Fredrickson, 2004)。一些研究尝试从两条途径对特质感恩和主观幸福感的因果关系进行探索。一条途径是利用感恩干预措施增加特质感恩和主观幸福的水平,以表明特质感恩对主观幸福感存在效应(Jackowska et al., 2016; Killen & Macaskill, 2015)。然而,这条途径发现的特质感恩对主观幸福感的效应可能只是反映与心理社会干预相关的普遍性机制,并没有证实特质感恩和主观幸福感的因果关系(Wampold, 2007)。另一条途径是采用纵向设计探讨特质感恩和主观幸福感之间的因果关系。Jans - Beken 等人(2018)研究发现特质感恩可以预测 7.5 个月之后的荷兰成年人的主观幸福感。遗憾的是这项研究没有考察身体和心理社会均会发生重大变化的青少年阶段(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1999),而已有研究发现青少年阶段的感恩随年龄增长而出现增长(Bono & Froh, 2009)。为此, Yang 等人(2020)采用两波数据的纵向设计探讨青少年特质感恩和主观幸福感的因果关系,结果支持了特质感恩正向预测生活满意度。总之,以往研究虽然也为特质感恩和主观幸福感的变化趋势及两者关系提供了一些新知识,但是没有在同一项研究中(同一批群体)同时探讨青少年特质感恩和主观幸福感的变化特性以及采用三阶段追踪设计探索青少年特质感恩和主观幸福感的动态关系。

1.2 生命意义的中介作用

生命意义(meaning in life, MIL)是指人们领会、理解或看到自己生活的意义,以及随之觉察到自己生命的目的、使命和首要目标(Steger, 2009)。生命意义包括认知维度的存在意义(presence of meaning, POM)与动机维度的追寻意义(search for mean-

ing, SFM)。存在意义是指人们对自己是否过着有意义生活的评价;追寻意义是指积极寻找人生意义和奋斗目标的程度(Steger, 2009)。

目前,也有研究者关注青少年生命意义的发展轨迹。譬如覃丽等人(2013)发现在初中时个体存在意义与追寻意义水平相当,而高中阶段学生存在意义呈降低发展趋势,追寻意义呈增长趋势发展,最终后者显著高于前者。Kiang 和 Witkow(2015)发现亚裔美国青少年的追寻意义总体相对稳定,存在意义呈现增长的发展趋势。Allan 等人(2015)研究还发现,每一人生阶段的经历和体验会带来自我与环境理解的差异,导致生命意义呈现出个体差异,并随年龄增长呈现线性或非线性的发展特点。

此外,生命意义在感恩与主观幸福感之间的作用也被着重关注。扩展建构理论强调特质感恩能拓宽人们思想模式,从而帮助个体更好地认识和解释自身价值与意义。研究表明高特质感恩个体具有更高水平生命意义(Kleiman et al., 2013; Li et al., 2021; 曹瑞琳等, 2023; 刘亚楠等, 2016),这可能是因为感恩的个体具有更强社会联结和更积极认知风格,进而有助于丰富生命意义体系的建构(Zhang, Ye, et al., 2021)。感恩内外在目标理论(The Internal and External Goal Theory of Gratitude)更是进一步认为感恩可以激发个体有意义的内在奋斗目标(生命意义)并促进个体为之努力奋斗,最终有助于提升个体幸福感水平(Bono & Froh, 2009)。也有研究发现,青少年生命意义水平越高,主观幸福感越强(沈清清, 蒋索, 2013)。侯湘玲等人(2016)的纵向研究也发现,生命意义对个体消极情感和积极事件都具有显著预测作用,具体表现为生命意义水平高的个体在 6 个月之后测得的抑郁状态显著下降,而且积极事件数量显著增加。林小园(2022)间隔三个月进行两次问卷调查,发现当个体寻求意义感较强时,其在意义寻求过程之中体验到自我价值和成就感,个体的自主需要、胜任需要也得到满足,进而提升个体的主观幸福感。

回顾相关研究发现:虽然对于特质感恩(Yang et al., 2020)、生命意义(Allan et al., 2015)以及主观幸福感(Jeong et al., 2018)等多个变量的发展轨迹或者两两之间的关系(Li et al., 2021; 曹瑞琳等, 2023; 侯湘玲等, 2016)已有探索,但是对于特质感恩、生命意义和主观幸福感三者随着时间推移而发生的动态关联仍未有文献报导。青少年面临学业生活的重大转型,交往方式和环境的改变导致其人格

和个人体验剧烈变化。同时,随着青少年去自我中心化、共情能力的发展,其感恩水平也迅速发展(Froh et al., 2010; McCullough et al., 2001; Van der Graaff et al., 2018)。鉴于此,本研究选择初一和高一学生作为研究被试,运用多元潜变量增长模型,考察青少年生命意义在特质感恩与主观幸福感动态发展之间的中介作用,以期能为提升青少年幸福感提供可能干预路径。综上,本研究检验以下假设:(1)青少年特质感恩的发展可以直接预测主观幸福感的发展;(2)特质感恩的发展可以通过生命意义的初始水平和发展速度间接影响主观幸福感的发展。

2 方法

2.1 被试

在征得学校领导、老师、家长三方的同意之后,采用方便取样法,选取湖南省 2 所初中初一和 1 所高中的高一学生为研究对象进行为期 1 年的追踪调查。第一次施测时间为 2021 年 6 月(记为 T1),共发放问卷 764 份,有效问卷 738 份,有效率为 96.47%;第二次施测时间为 2021 年 12 月(记为 T2);第三次施测时间为 2022 年 6 月(记为 T3)。由于转学、请假、外出等随机原因,87 名学生未完成完整的三次测试。将三次施测数据整合后,删除答题不完整、不认真答题或只有一次测量者,三次测试均有效的被试有 667 名,追踪率为 91.73%。其中,男生 326 人(48.15%),女生 351 人(51.85%);初一年级 405 人(59.82%),高一年级 272 人(40.18%);74 人(10.93%)来自城镇,603 人(89.07%)来自农村。学生平均年龄 14.01 ± 1.41 岁。研究经湖南师范大学伦理委员会批准。

2.2 研究工具

2.2.1 感恩问卷

采用由 McCullough 等人(2002)编制,并由魏昶等人(2011)修订的感恩问卷(The Gratitude Questionnaire-6, GQ-6),测量青少年的特质感恩。该问卷包含“生命中有太多我觉得要感谢的”等 6 道题目,要求被试根据近半年来的实际感受作答。量表采用李克特 7 点计分,其中第 3 题和第 6 题为反向计分。得分越高,说明被试的特质感恩水平越高。在本研究中感恩问卷三次测量的 Cronbach's α 系数分别为 0.63、0.78、0.81。

2.2.2 生命意义问卷

采用由 Steger 等人(2006)编制、王鑫强(2013)

修订的生命意义问卷(Meaning in Life Questionnaire, MLQ)。其中文修订版在国内中学生群体中具有良好的信效度,在国内被广泛用于个体生命意义测量。问卷包含追寻意义和存在意义两个维度。追寻意义包含“我在寻找能够令我的生命有意义的东西”等 5 道题;存在意义包含“我很了解自己人生的意义”等 5 道题。问卷采用李克特 7 点计分,其中第 9 道题反向计分。总分越高的被试生命意义水平越高。在本研究中生命意义问卷三次测量的 Cronbach's α 系数分别为 0.82、0.85、0.83。

2.2.3 生活满意度量表

采用由 Diener 等人(1985)编制的生活满意度量表(The Satisfaction with Life Scale, SWLS),用于测量被试感知到的生活满意度。生活满意度是主观幸福感的关键指标,是独立于积极、消极情感的更有效的、肯定的衡量标准(Diener, 1984)。生活满意度量表主要测量主观幸福感的认知成分,能较好反映人们对自身生活质量的总体评价和态度。该量表包含“我的生活大致符合我的理想”等 5 道题,采用李克特 7 点计分,得分越高说明被试对自身的的生活越满意。在本研究中生活满意度量表三次测量的 Cronbach's α 系数分别为 0.85、0.89、0.89。

2.3 数据处理

采用 SPSS 21.0 进行 Harman 单因素检验和相关分析。采用 Mplus 8.0 分三个步骤建立结构方程模型探索变量的发展轨迹及变量间的动态关系(王孟成, 2014b)。第一步,使用无条件潜变量增长模型分别考察各变量的发展轨迹,发展轨迹中的截距为发展的初始水平,斜率为发展的速度。第二步,控制性别、年级、家庭居住地等人口学变量后,建立多元潜变量增长模型检验特质感恩的截距和斜率对主观幸福感截距和斜率的预测作用。第三步,基于多元潜变量增长模型进行纵向中介分析,探讨变量间截距和斜率的关系以及生命意义的纵向中介效应。通过模型拟合指数 χ^2/df 、CFI、TLI、RMSEA、SRMR,判断模型与数据拟合情况(Hu & Bentler, 1999)。

3 结果

3.1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由于本研究采用问卷调查法收集同一批学生自我报告的数据,因此可能存在共同方法偏差。本研究主要通过反向计分、承诺对数据保密等方式控制可能存在的共同方法偏差。采用 Harman 单因子检验法对三次测量数据进行共同方法偏差检验(周浩, 龙立

荣, 2004)。结果表明,三次测量数据中特征值大于1的公共因子均为5个,且第一个公共因子的解释率分别为27.51%、32.32%、31.17%,均低于40%。因此本研究不存在严重共同方法偏差问题。

3.2 纵向等值

由于青少年正处于面对多种变化和挑战的过渡时期,这可能会影响被试对问卷的定性理解。因此,为了检验特质感恩、生命意义、主观幸福感的结构在三次测量(T1到T3)中是否一致,进行测量等值检验(王孟成, 2014a)。如表1所示,本研究通过建立三个等值模型来检验纵向等值。在参考各拟合指数判断模型拟合情况的同时,采用 ΔCFI 和 $\Delta RMSEA$ 的绝对值判断模型之间的差异情况, ΔCFI 、 $\Delta RMSEA < 0.01$ 说明模型间无显著差异(Cheung & Rensvold, 1999, 2002)。第一,建立形态等值模型(M1)。结

果显示模型拟合良好,支持接受形态等值的假设。第二,建立负荷等值模型(M2)。基于形态等值模型,设定不同测量点的因子负荷等值,检验同一条目在不同时间点测量的是否为同一构念。结果显示模型拟合良好, ΔCFI 、 $\Delta RMSEA < 0.01$ 说明支持指标负荷跨时间等值的假设。第三,建立项目截距等值模型(M3)。在上一步的基础上,设定每个指标三次测量的截距等同。结果显示 ΔCFI 、 $\Delta RMSEA < 0.01$,支持截距跨时间等值的假设。

3.3 变量的相关分析

青少年特质感恩、存在意义、追寻意义与主观幸福感3个时间点(T1, T2, T3)的相关系数矩阵如表2所示。结果表明,3次测量的特质感恩、存在意义、追寻意义和主观幸福感两两间均呈显著正相关。

表1 特质感恩、生命意义与主观幸福感的纵向等值模型

变量	模型	χ^2	df	CFI	RMSEA (90% CI)	ΔCFI	$\Delta RMSEA$
特质感恩	M1	564.654	114	0.913	0.076 [0.070, 0.083]		
	M2	594.141	124	0.910	0.075 [0.069, 0.081]	0.003	0.001
	M3	640.842	134	0.903	0.075 [0.069, 0.081]	0.007	0.000
生命意义	M1	1255.747	360	0.905	0.061 [0.057, 0.064]		
	M2	1279.513	376	0.905	0.060 [0.056, 0.063]	0.000	0.001
	M3	1306.015	392	0.903	0.059 [0.055, 0.062]	0.002	0.001
主观幸福感	M1	169.088	72	0.984	0.045 [0.036, 0.053]		
	M2	180.742	80	0.983	0.043 [0.035, 0.052]	0.001	0.002
	M3	222.838	88	0.978	0.048 [0.040, 0.055]	0.005	-0.005

注: M1 形态等值模型, M2 负荷等值模型, M3 项目截距等值模型。

表2 特质感恩、生命意义与主观幸福感相关矩阵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 特质感恩 T1	1											
2. 特质感恩 T2	0.26***	1										
3. 特质感恩 T3	0.24***	0.64***	1									
4. 追寻意义 T1	0.32***	0.22***	0.18***	1								
5. 追寻意义 T2	0.10*	0.33***	0.20***	0.26***	1							
6. 追寻意义 T3	0.10*	0.32***	0.30***	0.23***	0.51***	1						
7. 存在意义 T1	0.32***	0.19***	0.13**	0.34***	0.13**	0.05	1					
8. 存在意义 T2	0.11**	0.37***	0.27***	0.20***	0.39***	0.17***	0.35***	1				
9. 存在意义 T3	0.11**	0.34***	0.38***	0.13**	0.25***	0.26***	0.29***	0.58***	1			
10. 主观幸福感 T1	0.27***	0.09*	0.01	0.21***	0.14***	0.03	0.40***	0.19***	0.12**	1		
11. 主观幸福感 T2	0.08*	0.34***	0.22***	0.18***	0.26***	0.14**	0.18***	0.40***	0.24***	0.37***	1	
12. 主观幸福感 T3	0.08	0.31***	0.34***	0.10*	0.19***	0.15***	0.15***	0.39***	0.42***	0.31***	0.64***	1
M	30.68	30.61	30.44	24.34	23.45	23.27	20.23	20.39	20.28	20.58	21.17	20.56
SD	5.78	6.45	6.72	6.06	6.00	5.85	6.30	6.24	6.20	7.13	6.97	6.81

注: * $p < 0.05$, ** $p < 0.01$, *** $p < 0.001$,下同。

表 3 变量的无条件潜变量增长模型拟合指数及截距和斜率

变量	χ^2	df	RMSEA	CFI	TLI	平均数		斜相关
						截距	斜率	
特质感恩	1.250	1	0.023	0.999	0.998	31.12***	1.75***	-0.21**
存在意义	0.004	1	< 0.001	1.000	1.012	20.01***	0.94***	-0.38***
追寻意义	5.323	1	0.095	0.974	0.922	24.17***	-0.60**	-0.34**
主观幸福感	0.052	1	< 0.001	1.000	1.017	20.82***	1.06***	-0.38*

3.4 变量的发展轨迹:无条件潜变量增长模型

为考察青少年特质感恩、存在意义、追寻意义与主观幸福感的发展趋势,依次对各变量构建无条件潜变量线性增长模型。结果如表 3 所示,各变量的无条件潜变量增长模型拟合良好。具体来看,特质感恩、存在意义与主观幸福感的斜率均值均为正,且截距和斜率均呈显著负相关。这说明青少年特质感恩、存在意义与主观幸福感的发展呈线性递增趋势,且它们的初始水平越高,增长速度越慢。而追寻意义的斜率均值为负,且截距和斜率呈显著负相关。这说明追寻意义的发展呈线性递减趋势,且初始水平越高,追寻意义下降的速度越快。

3.5 特质感恩对主观幸福感发展轨迹的影响:多元潜变量增长模型

为考察特质感恩的发展是否对青少年主观幸福感的发展产生影响,建立多元潜变量增长模型。结果表明该模型拟合良好, $\chi^2(12) = 18.947$, RMSEA = 0.035, CFI = 0.987, TLI = 0.978, 最终模型见图 1。具体来看,特质感恩的截距能正向预测主观幸福感的截距($\beta = 0.29$, $p < 0.001$),表明青少年特质感恩的初始水平越高,主观幸福感的初始水平也越高。此外,特质感恩的斜率能正向预测主观幸福感的斜率($\beta = 0.31$, $p < 0.001$),也就是说特质感恩水平上升的越快,其主观幸福感发展的也越快,而特质感恩的截距对主观幸福感的斜率不存在显著的预测作用($\beta = -0.08$, $p = 0.40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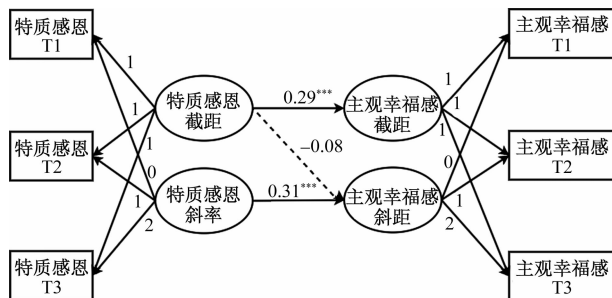


图 1 特质感恩与主观幸福感的多元潜变量增长模型

3.6 基于多元潜变量增长模型的中介分析

特质感恩的截距对主观幸福感的斜率无显著预

测作用,因此不开展对二者之间中介效应的检验。参照方杰等人(2021)的做法,建立多元潜变量增长模型进行纵向中介分析,结果表明该模型拟合良好, $\chi^2(48) = 179.142$, RMSEA = 0.075, CFI = 0.904, TLI = 0.868。具体路径如图 2 所示,特质感恩截距对存在意义与追寻意义的截距均具有显著正向预测作用($\beta = 0.60$, $p < 0.001$; $\beta = 0.58$, $p < 0.001$);且特质感恩的截距对存在意义截距的预测作用显著大于对追寻意义截距的预测(Wald $\chi^2 = 6.121$, $p < 0.05$)。存在意义与追寻意义的截距均能显著正向预测青少年主观幸福感的截距($\beta = 0.42$, $p < 0.001$; $\beta = 0.29$, $p < 0.05$),且存在意义截距对主观幸福感截距的预测效应显著大于追寻意义截距的预测效应(Wald $\chi^2 = 35.258$, $p < 0.001$)。同时特质感恩斜率仅对存在意义斜率具有显著正向预测作用($\beta = 0.45$, $p < 0.001$),这说明青少年的特质感恩增长越快,感知到的生命意义也会得到迅速增加;存在意义的斜率对主观幸福感的斜率也具有显著正向预测作用($\beta = 0.64$, $p < 0.01$),这说明青少年的存在意义得到迅速发展的同时,主观幸福感也会显著增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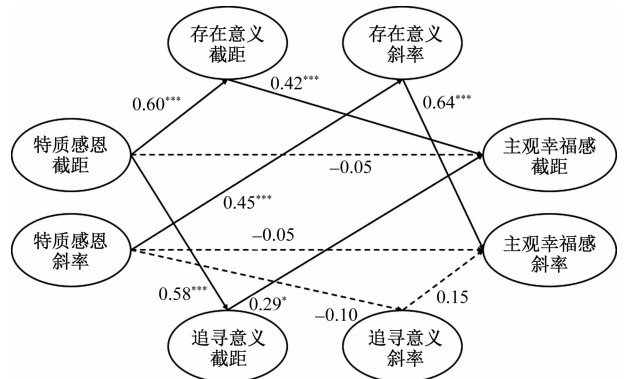


图 2 以存在意义与追寻意义为中介的多元潜变量增长模型

在路径分析的基础上进一步检验中介模型,结果如表 4 所示。结果表明青少年存在意义与追寻意义的截距在其特质感恩的截距与主观幸福感的截距间的中介作用均显著(中介效应值分别为 0.25、0.18),且存在意义截距的中介效应显著大于追寻

意义截距的中介效应 ($Wald \chi^2 = 29.120, p < 0.001$)。此外,青少年存在意义的斜率在其特质感恩的斜率与主观幸福感的斜率间的中介作用显著(中介效应值为 0.28)。

表 4 生命意义纵向中介模型中的间接路径

纵向中介模型	间接效应	SE	p
特质感恩截距→存在意义截距 →主观幸福感截距	0.25	0.073	0.001
特质感恩截距→追寻意义截距 →主观幸福感截距	0.18	0.076	0.028
特质感恩斜率→存在意义斜率 →主观幸福感斜率	0.28	0.111	0.011
特质感恩斜率→追寻意义斜率 →主观幸福感斜率	-0.01	0.017	0.387

4 讨论

本研究基于 3 次追踪数据建立潜变量增长模型,发现青少年特质感恩、存在意义以及主观幸福感的发展呈线性递增趋势,追寻意义呈线性递减趋势。通过建立多元潜变量增长模型发现特质感恩的发展对主观幸福感的发展具有直接效应,且特质感恩的发展能通过存在意义与追寻意义的初始水平及存在意义的发展速度对主观幸福感的发展产生间接影响。

4.1 特质感恩、生命意义以及主观幸福感的发展轨迹

本研究发现青少年特质感恩呈线性递增趋势,这与以欧美青少年为对象的研究结论一致(Kashdan et al., 2009)。感恩图式假说指出,感恩个体拥有独特图式,随着年龄增长,青少年的图式会越来越丰富(Wood et al., 2010)。换言之,随着年龄增长,青少年积累的感激内容不断增多,表现出能回忆更多的感激的人或事。同时,以往研究发现共情能力与感恩密切联系。随着年龄增长,青少年自我中心意识逐渐下降,共情能力逐渐增强(王建平等, 2011),特质感恩也随之得到发展。此外,防疫经历可能激发学生感恩情绪,这是个体对他人与社会给予帮助的一种内心认可,以及想要回报他人善举的一般心理倾向(凌霄, 潘之瑶, 2023)。

本研究还发现,青少年的存在意义呈线性递增趋势,而追寻意义呈线性递减趋势,这与国内外研究结果部分一致(Kiang & Witkow, 2015; 张荣伟, 2018)。随着年龄增长,青少年所感知到的生命意义呈上升趋势。这一方面是随着年龄的增加,青少年逐渐找到了人生方向与人生价值,因此体验

到的生命意义越深刻(冯西双, 2023)。另一方面是随着年龄增长,个体人生经历越丰富,感知到生命意义的来源也不断增多,因此对各种正负性生活事件的解读愈加深刻,可以从中获得更多意义体验(Read et al., 2005)。然而,随着感知到的生命意义逐渐增加,个体追寻生命意义的动力则逐渐减弱(张荣伟, 2018)。

本研究还发现青少年主观幸福感呈线性递增趋势,这与部分研究结果一致(常淑敏等, 2020)。这可能是一方面随着年龄增长,青少年认知能力得到提升,能更好地认识自身生活;同时随着社交和文体活动的丰富,他们获得幸福的途径也得到扩展(Yoon et al., 2008; 常淑敏等, 2020)。另一方面,本研究选取农村中学进行问卷调查。相较城市中学而言,农村学校对学生施加的学业压力较小,在这种氛围下个体同伴关系也更加和谐。因此,在良好校园氛围下个体主观幸福感随着自身认知的发展而发展。研究表明,社会变迁能够对人群的心理与行为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黄赐英, 2003)。学生群体的认知水平、人格特征仍处于发展阶段,尤其是未成年学生远未成熟,其心理状态更易受到新冠肺炎疫情等类似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的影响(徐鑫鹏等, 2021)。本研究发现,青少年主观幸福感并未受到显著影响,可能与疫情防控及时和学校严格管控有关。

此外,本研究发现青少年在特质感恩、生命意义及主观幸福感等指标上,发展的初始水平与其发展速度间均呈显著负相关。首先,这意味着青少年三个方面的初始水平对个体之后的发展均有持续影响。因此,为了提高青少年的生活质量,比起短期的干预,持续干预更重要(Kim & Yoon, 2020),这为提升青少年主观幸福感提供一定的实证研究基础。其次,这说明青少年的心理发展符合补偿发展模式(魏威等, 2018),即初始水平较低的青少年更可能呈现快速发展。这种发展潜力的激活很可能是因为环境或个体自身的优势(常淑敏等, 2020)。最后,这也暗示着青少年特质感恩、生命意义及主观幸福感在发展的最终水平上可能存在上限,而初始水平差异可能会随着自身发展逐渐缩小。启示教育者在对初始水平较低的青少年进行干预的同时,不要忽略初始水平较高的青少年。

4.2 特质感恩对主观幸福感发展轨迹的影响

本研究通过构建多元潜变量增长模型发现,青少年特质感恩的初始水平能正向预测其主观幸福感

的初始水平,这与前人研究结果保持一致(Alkozei et al., 2018; Ding & Zhao, 2018; Kong et al., 2021; Wang, 2020; 李兆良, 周芳蕊, 2018),同时也与感恩的内外在目标理论、积极情绪的扩展建构理论的观点相契合(Fredrickson, 2004; La Guardia et al., 2000)。这意味着如果能及时发现青少年的低感恩特质,就更有可能提前感知到个体低水平的主观幸福感。这提示家长和教师通过对青少年进行及时、合理、有效的感恩干预来提高个体的特质感恩水平和主观幸福感水平。其次,由于新冠疫情的影响,青少年关于感恩的感受得到很大程度的激发。根据Fredrickson的积极情绪拓展扩建理论,感恩情绪的瞬时扩展功能可以帮助学生拓展在注意、认知、行为上的范围,构建可以持续到未来的个体资源和社会资源,进行良好的环境应对,而对环境的良好适应又能进一步促进学生积极情绪的产生,形成一种螺旋式的上升(高正亮, 童辉杰, 2010),最终能够帮助学生达到丰盈的生命状态,进一步提高个体的主观幸福感。为此,我们可以通过感恩记录、感恩沉思、感恩拜访、观看感恩视频或组织感恩团体辅导活动等方法,引导学生分享发生在自己身上的感恩事件,获得感恩的情绪体验,从而提升学生的感恩水平,促进其适应环境(凌霄, 潘之瑶, 2023)。

与此同时,本研究进一步发现青少年的特质感恩水平无法预测其主观幸福感的后续变化。这可能是因为青少年主观幸福感的变化是一种自然发展特点,与自身感恩倾向的多少无关。然而,特质感恩的发展速度对主观幸福感的发展速度具有显著正向预测作用,即特质感恩上升趋势较快的学生,其主观幸福感的增长趋势也较快。这可能原因是青少年特质感恩与主观幸福感均在发展的关键期(Bono & Froh, 2009; Froh et al., 2009),随着青少年年龄的增长,认知能力不断发展所带来的特质感恩与主观幸福感出现共同伴随发展。这意味着青少年特质感恩的发展减缓甚至呈下降发展,可能预示着个体主观幸福感发展的停滞甚至降低,家长与教师需要及时关注个体的心理健康发展状态。同时这也提示家长与教育者要抓住青少年感恩意识形成与发展的关键时期,积极、及时地进行感恩干预(Bono & Froh, 2009)。这不仅可以更有效地提升青少年的特质感恩,而且有助于促进个体主观幸福感的发展。

4.3 生命意义的中介作用

基于多元潜变量增长模型的中介分析结果显示青少年特质感恩的截距能通过生命意义的截距间接

对主观幸福感的截距产生影响,具体体现在初始水平上存在意义与追寻意义均在青少年特质感恩与主观幸福感间起中介作用,这一结果与众多横向研究是一致的(Zhang, Yang, et al., 2021; Zhang, Ye, et al., 2021; 曹瑞琳等, 2023; 申琳琳, 张镇, 2020)。这验证并拓展感恩的内外在目标理论、积极情绪的扩展建构理论和幸福感的目标理论(Fredrickson, 2004; Holahan, 1988; La Guardia et al., 2000)。该结果意味着高特质感恩的青少年更可能发现、感知、体会生命的意义,也更有可能通过扩展思维来感知意义和确立内在目标,并在为实现目标而奋斗的过程中及达成目标时体验到更深层幸福感。另外,相较于追寻意义,存在意义的相对中介效应占比更大。这可能是因为存在意义与生活满意度均是在认知系统中进行组织、存储和评估的(Diener et al., 1985; Steger, 2009),这再次验证前人研究(Li et al., 2021)。这意味着青少年特质感恩通过影响认知进而影响生活满意度,即特质感恩对生命意义与主观幸福感的积极效用主要体现在能拓展个体的思维广度、增加对积极事件的编码和提取(Fredrickson, 2004)。这也提示学者为提升主观幸福感进行干预时,应将工作重心放在认知发展上。

同时,青少年正处于建立自我同一性的重要阶段(白学军, 王敬欣, 2013; 林崇德, 2002),他们对生命意义的认知不断增加。本研究发现青少年特质感恩的斜率主要通过生命意义的斜率间接影响主观幸福感的斜率,具体体现在存在意义的发展速度在特质感恩与主观幸福感间起完全中介作用。这可能是青少年随着年龄的增长,个人的逻辑思维能力得到发展、认知能力也更成熟,同时自我感知能力也得到提升(白学军, 王敬欣, 2013)。青少年特质感恩的发展速度能够直接影响其存在意义的发展速度。根据积极情绪的扩展建构理论(Fredrickson, 2004),这可能是因为随着感恩的增加,不仅个体思维广度得到扩展,能以更广视角看待所发生的事情,而且他们能以一种更积极认知方式对事物进行解读,因此个体感知到的生活意义也在不断增加。

同时,青少年存在意义的增长能显著预测主观幸福感的生长,这可能是因为拥有较高的生命意义感的青少年在面对生活事件时拥有更高的掌握感,因而经历过生命教育的青少年可能在面对生活事件所带来的情绪体验时也能够拥有更高的掌握感,从而对生活的满意度也随之增加(常保瑞, 方建东, 2020)。而追寻意义的发展速度的中介作用不显

著,这意味着比起增强青少年寻找生命意义的动机,感恩的积极效能更多体现在帮助青少年更好地认识、感知生命的意义,从而对生活的评价更满意。这提示家长与教师需要把握青少年生命意义发展的重要时期,帮助青少年认识到自己的内在目标、寻找并确立自己人生的意义。

4.4 研究启示与不足

本研究发现青少年特质感恩与生命意义的发展均能预测主观幸福感的发展,这启示教育者不应孤立看待青少年的心理发展,在发现某方面呈停滞或下降的发展状态时,应及时给予关注并进行系统干预。此外,教育者在未来需要着重关注青少年生命意义的发展,并通过多种方式促进青少年自我认知等方面的发展,最终促成主观幸福感的获得。

本研究存在以下不足:第一,本研究主要探讨特质感恩、生命意义等个体内部的因素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具有一定的局限性。持续幸福的理论模型指出个体幸福感主要受基因、个体自主意向活动与生活环境三个方面的影响,未来研究可以基于持续幸福的理论模型更全面地探讨影响青少年主观幸福感发展的因素;第二,本研究仅在一年时间内进行3次追踪调查,只能探索青少年特质感恩、生命意义以及主观幸福感的一次线性增长趋势。未来可以对青少年进行更长期且连贯的追踪,探索可能存在的其他发展轨迹如二次线性增长模型、曲线增长模型;第三,本研究进行为期一年的调查追踪,可能受到新冠疫情的影响,青少年的心理状态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未来研究需要考虑类似新冠疫情等重大意外事件的相关变量作为控制变量之后,再来考察其他变量之间的关系。

5 结论

本研究旨在分析青少年的特质感恩、存在意义与主观幸福感三者关系,结果表明,生命意义与主观幸福感之间存在因果预测关系,生命意义在其中起到重要作用。具体表现为:特质感恩初始水平通过存在意义和追寻意义进一步影响主观幸福感的初始水平;特质感恩的发展速度通过存在意义进一步影响主观幸福感的发展速度。

参考文献:

Allan, B. A., Duffy, R. D., & Douglass, R. (2015). Meaning in life and work: A developmental perspective. *The Journal of Positive Psychology, 10*(4), 323–331.

- Alkozei, A., Smith, R., & Killgore, W. D. (2018). Gratitude and subjective well being: A proposal of two causal frameworks. *Journal of Happiness Studies, 19*(5), 1519–1542.
- Bono, G., & Froh, J. (2009). Gratitude in school: Benefits to students and schools. In R. Gilman, E. S. Huebner, & M. J. Furlong (Eds.), *Handbook of positive psychology in schools* (pp. 77–88). Routledge/Taylor & Francis Group.
- Bücker, S., Nuraydin, S., Simonsmeier, B. A., Schneider, M., & Luhmann, M. (2018). Subjective well-being and academic achievement: A meta-analysis. *Journal of Research in Personality, 74*(5), 83–94.
- Cheung, G. W., & Rensvold, R. B. (1999). Testing factorial invariance across groups: A Reconceptualization and Proposed New Method. *Journal of Management, 25*(1), 1–27. <https://doi.org/10.1177/014920639902500101>
- Cheung, G. W., & Rensvold, R. B. (2002). Evaluating goodness-of-fit indexes for testing measurement invariance.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9*(2), 233–255.
- Diener, E. (1984). Subjective well-being. *Psychological Bulletin, 95*(3), 542–575.
- Diener, E., Emmons, R., Larsen, J., & Griffin, S. (1985). The satisfaction with life scale.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ssessment, 49*(1), 71–75.
- Diener, E., Oishi, S., & Tay, L. (2018). Advances in subjective well-being research. *Nature Human Behaviour, 2*(4), 253–260.
- Ding, F., & Zhao, H. (2018). Is the individual subjective well-being of gratitude stronger? A meta-analysis. *Advances in Psychological Science, 26*(10), 1749–1763.
- Fredrickson, B. L. (2004). Gratitude, Like Other Positive Emotions, Broadens and Builds. In R. A. Emmons & M. E. McCullough (Eds.), *The psychology of gratitude* (pp. 145–166).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Froh, J. J., Bono, G., & Emmons, R. (2010). Being grateful is beyond good manners: Gratitude and motivation to contribute to society among early adolescents. *Motivation and Emotion, 34*(2), 144–157.
- Froh, J. J., Yurkewicz, C., & Kashdan, T. B. (2009). Gratitude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in early adolescence: Examining gender differences. *Journal of Adolescence, 32*(3), 633–650.
- Holahan, C. K. (1988). Relation of life goals at age 70 to activity participation and health and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among Terman's gifted men and women. *Psychology and Aging, 3*(3), 286–291.
- Hu, L. T., & Bentler, P. M. (1999). Cutoff criteria for fit indexes in covariance structure analysis: Conventional criteria versus new alternatives.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A Multidisciplinary Journal, 6*(1), 1–55. <https://doi.org/10.1080/10705519909540118>
- Jackowska, M., Brown, J., Ronaldson, A., & Steptoe, A. (2016). The impact of a brief gratitude intervention on subjective well-being, biology and sleep. *Journal of Health Psychology, 21*(10), 2207–2217.
- Jeong, Y., Bong, C., & Hong, S. (2018). Analyzing change trajectory and determinants of life satisfaction of adolescents: An application of latent growth modeling. *Korean Journal of Youth Studies, 25*(1), 181

- 210.
- Jans - Beken, L. , Jacobs, N. , Janssens, M. , Peeters, S. , Reijnders, J. , Lechner, L. , & Lataster, J. (2018). Reciprocal relationships between State gratitude and high - and low - arousal positive affects in daily life: A time - lagged ecological assessment study. *The Journal of Positive Psychology, 14*, 512 - 547.
- Kashdan, T. B. , Mishra, A. , Breen, W. E. , & Froh, J. J. (2009). Gender differences in gratitude: Examining appraisals, narratives, the willingness to express emotions, and changes in psychological need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77*(3), 691 - 730.
- Killen, A. , & Macaskill, A. (2015). Using a gratitude intervention to enhance well - being in older adults. *Journal of Happiness Studies, 16*(4), 947 - 964.
- Kiang, L. , & Witkow, M. R. (2015). Normative changes in meaning in life and links to adjustment in adolescents from Asian American backgrounds. *Asian American Journal of Psychology, 6*(2), 164 - 173.
- Kim, P. H. , & Yoon, H. M. (2020). The effect of acculturative stress on life satisfaction of adolescents with multicultural background in mediation on self - esteem: A longitudinal mediation analysis using multi-variate latent growth curve model. *Korean Journal of Youth Studies, 27*(1), 25 - 53.
- Kleiman, E. M. , Adams, L. M. , Kashdan, T. B. , & Riskind, J. H. (2013). Gratitude and grit indirectly reduce risk of suicidal ideations by enhancing meaning in life: Evidence for a mediated moderation model. *Journal of Research in Personality, 47*(5), 539 - 546.
- Kong, F. , Yang, K. , Yan, W. , & Li, X. (2021). How does trait gratitude relate to subjective well - being in Chinese adolescents? The mediating role of resilience and social support. *Journal of Happiness Studies, 22*(4), 1611 - 1622.
- La Guardia, J. G. , Ryan, R. M. , Couchman, C. E. , & Deci, E. L. (2000). Within - person variation in security of attachment: A self - determination theory perspective on attachment, need fulfillment, and well - being.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79*(3), 367 - 384.
- Li, J. B. , Dou, K. , & Liang, Y. (2021).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resence of meaning, search for meaning, and subjective well - being: A three - level meta - analysis based on the meaning in life questionnaire. *Journal of Happiness Studies, 22*(1), 467 - 489.
- McCullough, M. E. , Emmons, R. A. , & Tsang, J. A. (2002). The grateful disposition: A conceptual and empirical topography.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82*(1), 112 - 127.
- McCullough, M. E. , Kilpatrick, S. D. , Emmons, R. A. , & Larson, D. B. (2001). Is gratitude a moral affect?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27*(2), 249 - 266.
- Mihoko, D. J. , & Kao, G. (2007). Are racial identities of multiracials stable? Changing self - identification among single and multiple race individuals. *Social Psychology Quarterly, 70*(4), 405 - 423.
- Read, S. , Westerhof, G. J. , & Dittmann - Kohli, F. (2005). Degree and content of negative meaning in four different age groups in Germany.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ging and Human Development, 61*(2), 85 - 104.
- Shek, D. T. , & Liu, T. (2014). Life satisfaction in junior secondary school students in Hong Kong: A 3 - year longitudinal study. *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 117*(3), 777 - 794.
- Steger, M. F. (2009). Meaning in life. In S. J. Lopez & C. R. Snyder (Eds.), *Oxford handbook of positive psychology* (2nd ed. , pp. 679 - 687).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Steger, M. F. , Frazier, P. , Oishi, S. , & Kaler, M. (2006). The meaning in life questionnaire: Assessing the presence of and search for meaning in life. *Journal of Counseling Psychology, 53*(1), 80 - 93.
- Van der Graaff, J. , Carlo, G. , Crocetti, E. , Koot, H. M. , & Branje, S. (2018). Prosocial behavior in adolescence: Gender differences in development and links with empathy. *Journal of Youth and Adolescence, 47*(5), 1086 - 1099.
- Vujcic, M. T. , Brajša - Žganec, A. , & Franc, R. (2019). Children and young peoples' views on well - being: A qualitative study. *Child Indicators Research, 12*(3), 791 - 819.
- Wampold, B. E. (2007). Psychotherapy: The humanistic (and effective) treatment. *American Psychologist, 62*(8), 857 - 873.
- Wang, Y. (2020). College students' trait gratitude and subjective well - being mediated by basic psychological needs. *Social Behavior and Personality: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48*(4), 1 - 10. <https://doi.org/10.2224/sbp.8904>
- Wood, A. M. , Froh, J. J. , & Geraghty, A. W. (2010). Gratitude and well - being: A review and theoretical integration. *Clinical Psychology Review, 30*(7), 890 - 905.
- Wood, A. M. , Maltby, J. , Stewart, N. , & Joseph, S. (2008). Conceptualizing gratitude and appreciation as a unitary personality trait. *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44*(3), 621 - 632.
-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Ed.). (1999). *Programming for adolescent health and development: Report of a WHO/UNFPA/UNICEF Study Group on Programming for Adolescent Health*. Retrieved from <https://iris.who.int/handle/10665/42149>
- Yang, K. , Yan, W. J. , Jia, N. , Wang, Q. L. , & Kong, F. (2020). Longitudinal relationship between trait gratitude and subjective well - being in adolescents: Evidence from the bi - factor model. *The Journal of Positive Psychology, 16*(6), 802 - 810.
- Yoon, E. , Lee, R. M. , & Goh, M. (2008). Acculturation, social connectedness, and subjective well - being. *Cultural Diversity & Ethnic Minority Psychology, 14*(3), 246 - 255.
- Zhang, P. , Ye, L. , Fu, F. , & Zhang, L. G. (2021). The influence of gratitude on the meaning of life: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family function and peer relationship. *Frontiers in Psychology, 12*, 680795. <https://doi.org/10.3389/fpsyg.2021.680795>
- Zhang, Q. , Yang, Y. , & Zhang, G. L. (2021). Influence of life meaning on subjective well - being of older people: Serial multiple mediation of exercise identification and amount of exercise. *Frontiers in Public Health, 9*, 515484. <https://doi.org/10.3389/fpubh.2021.515484>
- Zhu, X. , & Shek, D. T. (2021). Parental factors and adolescent well - being: Associations between developmental trajectories. *Children and Youth Services Review, 127*, 106071. <https://doi.org/10.1016/j.childyouth.2021.106071>

- 白学军,王敬欣.(2013).《发展心理学》.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
- 曹瑞琳,梅松丽,梁磊磊,李传恩,张莹.(2023).感恩与大学生网络成瘾的关系:核心自我评价和生命意义感的中介作用.《心理发展与教育》,39(2),286-294.
- 常保瑞,方建东.(2020).可协商命运观对少数民族大学生生命意义感的影响:自我效能感的中介作用.《民族教育研究》,31(02),142-148.
- 常淑敏,郭明宇,王靖民,王玲晓,张文新.(2020).学校资源对青少年早期幸福感发展的影响:意向性自我调节的纵向中介作用.《心理学报》,52(7),874-885.
- 方杰,温忠麟,邱皓政.(2021).纵向数据的中介效应分析.《心理科学》,44(04),989-996.
- 冯西双.(2023).负性生活事件对青少年抑郁症自杀意念的影响:认知融合、生命意义感的链式中介作用(硕士学位论文).江西中医药大学,南昌.
- 高天亮,董辉杰.(2010).积极情绪的作用:拓展-建构理论.《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18(02),246-249.
- 郭春涵.(2019).大学生自我中心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自尊的中介作用.《心理与行为研究》,17(04),546-552.
- 侯湘铃,胡天强,谢琼.(2016).青少年生命意义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自我效能的中介作用.《心理技术与应用》,4(12),738-743.
- 黄赐英.(2003).社会变迁与心理健康.《学术交流》,(04),30-32.
- 李兆良,周芳蕊.(2018).大学生内隐感恩与外显感恩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26(4),811-813.
- 林崇德.(2002).《发展心理学》.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
- 林小园.(2022).初中生生命意义感与学业成就的关系:横断与纵向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广西师范大学,桂林.
- 刘亚楠,张舒,刘璐怡,刘慧瀛.(2016).感恩与生命意义:领悟到的社会支持与归属感的多重中介模型.《中国特殊教育》,4,79-83.
- 凌霄,潘之瑶.(2023).疫情后期武汉居家高中生感恩对学习投入的影响:心理韧性的中介作用.《卫生职业教育》,41(03),135-139.
- 覃丽,王鑫强,张大均.(2013).中学生生命意义感发展特点及与学习动机、学习成绩的关系.《西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35(10),165-170.
- 任海霞,黄瑶,郝娜,崔丽莹.(2021).特质感恩与状态感恩对初中生合作水平的影响.《心理科学》,44(01),97-103.
- 申琳琳,张镇.(2020).隔代教养意愿与祖辈主观幸福感的关系:家庭亲密度与生命意义感的链式中介作用.《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28(4),834-839.
- 沈清清,蒋索.(2013).青少年的生命意义感与幸福感.《中国心理卫生杂志》,27(08),634-640.
- 王建平,喻承甫,曾毅茵,叶婷,张卫.(2011).青少年感恩的影响因素及其机制.《心理发展与教育》,27(3),260-266.
- 王孟成.(2014a).《潜变量建模与Mplus应用,基础篇》.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
- 王孟成.(2014b).《潜变量建模与Mplus应用,进阶篇》.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
- 王鑫强.(2013).生命意义感量表中文修订版在中学生群体中的信效度.《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21(5),764-767.
- 王振宇.(1992).《儿童社会化与教育》.北京: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
- 魏昶,吴慧婷,孔祥娜,王海涛.(2011).感恩问卷GQ-6的修订及信效度检验.《中国学校卫生》,32(10),1201-1202.
- 魏威,邓赐平,李其维.(2018).学龄早期词语阅读习得对阅读理解能力的预测作用:初始水平和发展速率的贡献.《心理科学》,41(3),559-564.
- 向燕辉,马丽平.(2024).初中生认知与情感幸福感发展趋势及影响因素:基于潜变量增长模型分析.《心理发展与教育》,40(5),645-657.
- 徐鑫鹏,邢雨杰,王紫烟,刘康,殷晓琳,王峻晨,孟繁强.(2021).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中国学生群体主观幸福感等心理状况及其影响因素的研究.《心理月刊》,16(20),34-38+76.
- 叶颖,张琳婷,赵晶晶,孔凤.(2023).感恩与社会幸福感的双向关系:来自长期追踪法和日记法的证据.《心理学报》,55(07),1087-1098.
- 张荣伟.(2018).《大学生生命意义的特点及影响机制》(博士学位论文).上海师范大学.
- 周浩,龙立荣.(2004).共同方法偏差的统计检验与控制方法.《心理科学进展》,12(6),942-950.
-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2023).《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生心理健康工作专项行动计划(2023-2025年)的通知》(教体艺〔2023〕1号).取自https://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2305/content_6857361.htm

The Effect of Trait Gratitude on Subjective Well-being during Adolescence: Longitudinal Explanatory Effect of Life Meaning

LI Dan^{1,3} CHEN Jiayu^{1,3} LIU Sige² WU Dehua^{1,3} YIN Huazhan^{1,3}

(1. School of Educational Science, Hunan Normal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81; 2. Longgang District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ity Foreign Language Group Lixue Primary School, Shenzhen 518100; 3. Cognition and Human Behavior Key Lab of Hunan Province, Changsha 410081)

Abstract: This study aims to examine the developmental trajectories of adolescent trait gratitude, meaning in life,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as well as the dynamic relationships among them and the longitudinal mediating role of meaning in life. A self-report questionnaire was used to conduct a three-wave longitudinal study of 764 middle school students in Hunan Province. A multivariate latent growth model was used for analysis. Results showed that: (1) Adolescents trait gratitude, presence of meaning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all showed significant linear increases, and search for meaning decreased linearly; (2) The initial level of trait gratitude could positively predict the initial level of subjective well-being, and the growth rate of trait gratitude could predict the growth rate of well-being effectively; (3) At the initial level, both the presence of meaning and search for meaning played mediation role between trait gratitude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And in the growth rate, only the presence of meaning played a mediating effect between them. This implies that the initial level of trait gratitude further influences the initial level of subjective well-being through the presence and search for meaning; The growth rate of trait gratitude further affects the growth rate of subjective well-being through the presence of meaning. These findings have practical implications for understanding critical period in adolescent psychological development and promoting healthy psychological growth.

Key words: adolescence; trait gratitude; presence of meaning; search for meaning; subjective well-being; multivariate latent growth model